

# 试论冯玉祥由北洋 军阀参加国民革命的转变

刘 曼 容

冯玉祥“是一生不断追求进步的爱国将领”<sup>①</sup>，“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sup>②</sup>。1926年9月的五原誓师，是他曲折奋斗中发生的第一次重大的革命转变，即由一个北洋军阀中分化出来的将领，转而公开正式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本文拟对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转变的原因、表现及其评价作一探讨。



一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冯玉祥的这次重大革命转变不是偶然的，不能武断地说成是政治投机，或简单地看作是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

## 1. 长期爱国民主思想发展的继续

冯玉祥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生长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急剧动荡的年代。其父当过泥瓦匠和雇工，后在淮军中当一名下级军官。他从小生活在淮军驻扎的保定一带农村。由于家庭生计艰难，7、8岁时就拔草拾柴干农活，亲身体会了农民生活的苦楚，形成了他日后浓厚的农民意识和平民思想以及“难以克服的农民性格”，“时时刻刻忘不掉改革劳苦大众生活的职志。”<sup>③</sup>

为了糊口，冯从少年起便走上吃粮当兵之路，11岁入淮军补兵缺，1896年正式入伍。从小辗转各地的兵营生活，使他目睹了满清王朝的腐败，洋鬼子欺压中国之可恶。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使他“感受很大的刺激”，心想今后“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寸土地决不许由我手里让日本夺了去。”<sup>④</sup>“遂立志为爱国军人，以御外侮而雪国耻。”<sup>⑤</sup>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又目击了侵略军烧杀奸抢的种种残暴，十分愤慨，爱国民族思想日益强烈。

这种从小萌发出来的朴素的救国救民思想，对他一生的行动具有很大影响，正如后来他在回顾自己的经历中所说：“我是穷小子出身”，“完全由行武出来，所以身经若干艰难困苦，深知社会中下层民众的隐痛，……自然看见社会中的种种不平，容易激发反抗的决心。这就是我屡次参加革命运动的本因。”<sup>⑥</sup>

由于他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内在因素，所以每当革命运动兴起时，便积极响应，倾向革命。辛亥革命中，他与王金铭、施从云等人举兵，发动了滦州起义。护国战争时，他参加反袁阵营，在四川与蔡松坡联络，并助成四川独立。张勋复辟后，他率军在廊坊誓师讨伐，首先攻入北京，击溃辫兵。护法战争时，他同情护法运动，在浦口、武穴屯兵不进，通电主和，牵制了北洋军阀南下的队伍。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与胡景翼、孙岳联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清朝废帝溥仪出宫，电请孙中山北上，并将所属部队改称以“真爱民、不扰民，誓死救国”为宗旨的中华民国国民军，从北洋军阀中分化出来，自成体系。

1925年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爆发，他呼吁全世界基督教徒主持正义，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由于反响寂然，使他由过去对基督教的笃信转至失望，遂放弃基督教义，辞退基督牧师，转而聘请苏联顾问和国民党工作人员到军中官兵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并主张厉兵秣马，对帝国主义宣战，“甘愿身作前驱，力与彼獠相周旋。虽粉身碎骨，亦所不辞”<sup>⑦</sup>。他下令全军减薪捐款，救援慰问五卅惨案死难烈士家属和受伤工人学生。激进的冯玉祥，与当时压迫民众甘当帝国主义鹰犬的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们形成鲜明的对照，“真有点民族思想”<sup>⑧</sup>。在其辖区内，群众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国共两党组织普遍发展壮大。所以，冯当时被人称之为“基督将军”变成了“赤色将军”。

冯玉祥以他固有的爱国民主思想为轴心，随着时代革命潮流而不断前进，这是他和当时一般军阀的迥然不同之处，也是他转变参加国民革命的内在思想基础。

## 2. 帝国主义和直奉等军阀联合进攻的压迫

帝国主义和直奉晋军阀联合进攻的压迫，是冯玉祥转变参加国民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北京政变后，他虽与国共两党、苏俄发生联系，但拒绝加入国民党，未公开标明联俄联共旗帜。虽然他对列强和军阀的幻想已经动摇，但时过境迁，这种思想又复滋长。他一方面极欲寻求革命阵营的帮助，共同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另一方面却依然保持“不党不派，不南不北”的超然态度。当1925年11月底国共两党在北京发动推翻段祺瑞政府的首都革命时，冯玉祥表示他将自始至终支持段政府，并指示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告之国民军将不同任何党派、集团敌对，也不为其同化。他真正转向国民革命则是在1926年春直奉晋军阀联合进攻压迫国民军之后。

1925年底，冯玉祥国民军处于鼎盛时期，拥兵40万，占据北京、察哈尔、绥远、热河、直隶、河南、陕西、甘肃及山东一部分广阔地区，“战斗力甲于全中国军队”<sup>⑨</sup>。国民军势力壮大及其倾向革命，“仿佛南方国民政府与北方国民军可以会合起来，支配全国政权，成为一比较赤色的政府之形势。”<sup>⑩</sup>这个形势对帝国主义和直奉军阀是致命威胁。因此，日、英等帝国主义便策动直奉军阀结成了以“反赤”为目标的反革命同盟，其“反赤”对象就是“苏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广东国民政府、冯玉祥及国民军”<sup>⑪</sup>，并制定了“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先扑灭“北赤”冯玉祥，再剿灭“南赤”广州国民政府。于是，从1926年1月起，直奉军阀联合起来从河南、山东、直隶向冯玉祥国民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面临强敌，冯玉祥及其将领力图妥协求存。为转移敌人视线，他再度宣布下野，退居幕后。此举不仅未能阻止反而加速了直奉军阀的反革命联合。为使帝国主义实行中立，冯军将领曾发表了一项含有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内容的宣言，然而结果徒劳无益。大沽口事件中，日本人炮击国民军，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提出最后通牒，“其矛头无疑是针对冯的武装力量的”<sup>⑫</sup>。为与奉系张作霖妥协，多次发密电、派密使与奉磋商，却屡遭拒绝，“效如捕风”<sup>⑬</sup>。此时的段祺瑞执政府为稳固自己的统治，拟“派曾毓隽、姚震之通谋奉军，里应外合，消灭国民军于北京”<sup>⑭</sup>。为向直系吴佩孚求和，不仅函电交驰，密使往返，而且还作出了释放曹锟、驱逐段祺瑞、迎吴佩孚北上主政的输诚行动，得到的却是国民军应“全体缴械”的强硬回答。冯玉祥不仅在政治上四面临敌，处境孤立，在军事上也迭遭重创，至3月下旬，国民军连失山东、河南、天津、直隶，退往京畿。不久又迫往南口。

正当冯玉祥处于进退维谷、一筹莫展时，南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阵营不断壮大。广州国民政府已取得两次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及南征的胜利，统一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正积极准备出师北伐。这使失败思绪萦绕心头、苦闷徬徨的冯玉祥深切感受到蓬勃发展的国

民革命的威力，从自己孤军奋斗的教训中认识到救国不能光凭军事实力，还要靠主义、政党和合作，终于舍弃了“君子不党”的陈旧观念，决心投入国共合作的革命阵营，开始了他政治思想和行动的重大转变。3月20日，他启程赴苏考察，4月在赴苏途中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同时，他又派代表马伯援到粤请援，嘱其“将国民军之宗旨及工作，向党中（注：国民党中央）陈述，最少限度，国民军必为国民党合作，解决国事。”<sup>⑮</sup>

### 3. 国共两党和苏俄的积极帮助

冯玉祥因其具有朴素的爱国救民思想，受到了国共两党和苏俄的重视和帮助，逐步将其朴素的爱国救民思想上升到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思想的高度。

早在1923年冯玉祥驻军南苑期间，孙中山派马伯援到京访问冯玉祥，冯玉祥表示要与国民党往来。接着，孙中山又派孔祥熙携带他亲笔手书的《建国大纲》会晤冯玉祥。冯玉祥读《建国大纲》之后，认为它是“中国唯一的对症药方”，“觉得太好了，太完全了，心里涌起了一种兴奋钦慕之情”<sup>⑯</sup>。因此，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立即电请孙中山“即日北上，指导一切”<sup>⑰</sup>。孙中山北上到京后，送给冯玉祥部6000本《三民主义》，1000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他全数分发给各部队，令官兵悉心研读。1925年冯玉祥部队驻张家口时，“国民军与国民党之关系，非常密切”<sup>⑱</sup>。国民党要人徐谦、孙科、孔祥熙、李石曾、吴稚晖、李烈钧、钮永建等时相往来，对其“军事政治均多方赞助”<sup>⑲</sup>。国民军退守南口时，广州国民政府即应冯玉祥之请，派李烈钧前“往张家口，协助张之江、鹿钟麟策划南口的战守”<sup>⑳</sup>。并于4月10日致信冯玉祥，鼓励他“取鉴前失，益加奋斗”，“困而弥坚，勇猛进行”，告之国民政府正“积极筹备北伐，期能于相当时期，与贵军会师中原，共定国难，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sup>㉑</sup>冯玉祥赴苏途中路过库伦时，鲍罗廷、徐谦、于右任、顾孟余、陈友仁等前往，多次商谈如何救民救国及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之要事，并劝说他加入国民党。冯玉祥欣然允诺，即由徐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对冯玉祥也作了大量争取工作。北京政变后，中共北方区委迅速制定了争取冯玉祥，打击段祺瑞、张作霖的策略。后来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强调“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在帮助国民军。”<sup>㉒</sup>李大钊多次前往张家口作冯玉祥的工作，帮助冯设立了俱乐部和研究孙文主义小组等学习机构，开辟了国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中共北方区委利用派政治工作人员和帮助办报纸、办学校的机会，陆续将一批共产党人派赴国民军。至1926年9月五原誓师时，“合共在西北军中约有一百七八十同志”<sup>㉓</sup>。冯玉祥访苏期间，刘伯坚以华人协会和《前进报》等团体的身份会见冯玉祥。由于冯玉祥“受俄共党影响很深，所以对中国CP也特别注意”<sup>㉔</sup>，极欲寻求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导，并请刘伯坚介绍共产党人与之谈话。经刘伯坚的荐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与冯玉祥及其随行人员见面，进行了长达3天的谈话，“结果颇好”，使冯“对中国CP五年来之主张非常满意”<sup>㉕</sup>，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苏联政府对冯玉祥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北京政变后，经李大钊等人的介绍，冯玉祥结识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很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冯玉祥后来回忆说：“我们的接触，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接近，于是我的思想和许多政治方面的见解也慢慢起了变化”<sup>㉖</sup>。冯玉祥产生了对苏联的无限向往之情，请求苏联的援助。1925年3月，苏联政府通过了援助国民军武器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不久，两个苏联军事顾问组分赴张家口和开封，帮助冯玉祥建立了炮兵、步兵、骑兵、工程兵等学校。从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国民军共得到苏联援助的步枪55800余支，子弹5820万发，手榴弹1万多枚，机枪230挺<sup>㉗</sup>。1925年夏秋间，冯玉祥派参谋长熊斌率团长以上的军官代表团到苏联参观。后来，冯玉祥听了熊斌

的访苏报告后，很受教育，决定亲赴苏联考察。1926年5月9日，冯玉祥抵莫斯科，受到了苏联各界的热烈欢迎。在苏期间，他进行了广泛的参观访问，会见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许多领导人，同时还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他深受世界革命空气的熏染，政治认识得到迅速提高。他感慨地说：“我有幸看到不少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工作的共产党人。”“共产党的英勇无畏、高昂士气和自觉地意识到对全人类所负的责任，这使我十分钦佩。”“红军的训练方法极其有效”，“红军的教育原则是史无前例的。”<sup>②</sup>回首以往，他痛感自己的短处是只顾目前，无远大眼光，偏重军事，无政治办法，从而深刻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加为行动中心的党的组织不可”<sup>③</sup>。

于是，冯玉祥决心令国民军全体官兵加入国民党。6月17日，他在莫斯科致函蒋介石、谭延闿，郑重表示：“救国之方惟有遵照总理中山先生遗训，从事于国民革命。”<sup>④</sup>同时，又派刘骥、李鸣钟为全权代表由莫斯科去广州，与国民党中央接洽国民军入党手续，并与国民政府商定共同革命计划。通过协商，刘骥与谭延闿、徐谦、宋子文、孙科等达成了两项协议：一、冯玉祥统率国民军接受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二、国民政府对于国民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一律待遇。稍后，8月23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冯玉祥为国民军的国民党党代表，广州国民政府任他为国民政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冯玉祥终于跨入了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阵营。

由此可见，冯玉祥的转变，既是救国救民激情的迸发，也是屡遭失败的醒悟；既有时代革命潮流的吸引，也有身临困境的逼迫；既有国共两党、苏俄帮助的推动，也有他顺乎潮流、与时俱进的内在动力。

1926年9月16日，从莫斯科归国的冯玉祥到达绥远五原，情怀难已，立即发表了著名的五原誓师宣言，宣告：“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决议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sup>⑤</sup>次日，举行誓师典礼，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职，并通电全国：“中山主义，驱我归来”<sup>⑥</sup>。从此，他公开正式地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实现了重大的革命转变。他这次革命转变的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高举反帝反封建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革命旗帜

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宣言中明确表示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立场，指出：中国“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压迫”，“要想战胜军阀，必须先打倒帝国主义”<sup>⑦</sup>。他在誓师典礼上代表全军宣誓：“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sup>⑧</sup>

关于联俄，冯玉祥在宣言中解释了与苏联亲善的原因，指出：“苏联自动地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平等待我，自是引起我们的好感，使我们彼此亲善。”<sup>⑨</sup>他要求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他准备工作人员4、50名，还将自己的子女安排在苏联学习和工作。苏联政府对他参加北伐战争给予了大力支持，除应他的请求派来乌斯曼诺夫、赛福林等军事顾问外，还调拨了大量的军械弹药。当时存放于库伦待运的有轻重机枪2千余挺，步枪20万支，子弹2万万发，大炮200多门，还有钢甲汽车和坦克车<sup>⑩</sup>。

关于联共，冯玉祥坚决邀请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与自己一同归国主持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回国途中，他阅读了《向导》周报，认为其“主张颇有得余心之同然者”<sup>⑪</sup>。他还致信陈独秀，请其协助物色政治画报人才和代为筹划在京、津、沪择两处开办报馆事宜，要求陈“对于政治意见、时局主张不断的来信，指导我们的工作。”<sup>⑫</sup>冯玉祥及其将领采纳了李大

到“出宁夏、取潼关，而后会师北伐”的建议，确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为统一领导西北革命运动，冯玉祥与共产党人刘伯坚、杨明轩、于树德合作组成了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分会（后改为西安分会），开创了西北地区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新局面。西安成为北方“中国革命的中心”<sup>⑳</sup>。

关于扶助农工，冯玉祥指出：“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要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之团体，共负革命之责任。”<sup>㉑</sup>冯玉祥通令全军将士把写有“军队须是为人民的武力”字样的白布小方块，缝于右襟，以“念念不忘为民众努力之要义。”<sup>㉒</sup>在冯玉祥及其国民军联军的赞助下，其辖区的西北特别是陕西出现了空前的群众大革命高潮。陕西全省有50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农协会会员达75万余人，其中武装农民在10万以上。组织武装起来的广大农民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进行了清算、追赃、游乡、公审、关押、甚至枪毙，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陕西成为当时全国农运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 2. 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改造了国民军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开展了国民军联军的革命化政治化运动。首先成立了内有共产党员刘伯坚、张兆丰为执行委员的国民党国民军联军最高特别党部，其下层层设立国民党党部。其次，设立了由刘伯坚任副部长兼代理部长（后为政治部长）的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建立部队的政治工作制度。当时，中共中央应冯玉祥之请，先后从上海、北京、黄埔等地派遣了2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去国民军联军中作政治工作。一批共产党人担任各级政治部门的领导。如魏野畴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刘志丹、宣侠父、方仲如、贾宗周、李世乐分别为马鸿逵、孙良诚、石友三、刘郁芬、韩复榘部的政治处长，曹力如任杨虎城部代理政治处长，等等。为了指导政治工作的进行，中国共产党特制定《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冯玉祥也多次电令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各军将领对所部官兵详细说明三民主义、国民党、救国救民、取消不平等条约等问题之要义。对“将领有不听政治讲演者，则召来总司令室罚跪。冯每日均亲自向数万兵士讲演二、三小时。”<sup>㉓</sup>因此，国民军联军的政治工作迅速而普遍地开展起来。第三，共产党人掌握了一定的武装力量。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长兼卫队师师长的史可轩，领导建立了一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约千余人的政治保卫队，由共产党员姚丹峰、许权中（后为任耕三）分任大队长。同时，以共产党员史可轩、李林、邓希贤（小平）、许权中分任校长、付校长、政治部主任、总队长的中山军事学校，学员700余人也是我党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另外，在石谦旅、杨虎城部、甄寿珊师等部队中，建立了共产党的“军支”。共产党员李象九任石谦旅第3营营长，谢子长为连长，张兆丰为国民军联军第5军第3师师长。

在冯玉祥和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军建立了革命制度和政治工作，增加了新鲜血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使其性质发生了变化，即由北洋军阀中分化出来的部队转变为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部队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风貌。正如周恩来所赞誉的：“五原誓师后，又加以政治训练，西北军遂成为当时之雄。”<sup>㉔</sup>

## 3. 率领国民军联军参加北伐战争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挥军南向，长驱千里，进行了解围西安战役，击败了刘镇华8万镇嵩军，收复了陕西，从而使陕、甘、绥连成一片，纳入国民军的势力范围。这不仅改观了西北战局，而且直接威胁和牵制了武汉以北的奉军、晋军和吴佩孚直军残余部队，使国民革命军能集中兵力东进，对江西、福建、浙江等战场的胜利进军起了战略配合作用。

1927年5月至6月初，冯玉祥又率领军队出潼关，攻洛阳、郑州，进行了会师中原战役，消灭了吴佩孚直军残余，打败了奉军，将其赶到黄河以北，成功地配合武汉北伐军取得了第二期北伐的胜利。

冯玉祥在这次革命转变中，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旗帜，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改造了国民军，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和中国大革命，写下了他一生中极其光辉的一页。



冯玉祥的这次革命转变是有限度的，主要因其政治思想、阶级地位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局限所致。

冯玉祥怀着激情和热望参加了国民革命，但他所理解的“国民革命”，仅仅是推翻北洋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而没有认识到：“国民革命应该首先是一个农民革命”<sup>④</sup>，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他断言：“中国为产业落后之国家”，“全国并无阶级可分，斗争何有。否则，必演成民与民间之仇杀，使社会大乱而后已！故在中国只有国民革命，断无阶级斗争！”劝请共产党应立即“停止农工运动之阶级斗争，免使天下汹汹。”<sup>⑤</sup>因此，当工农群众革命蓬勃高涨时，他的思想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而倒退了。这就是他反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革命的最深刻的思想原因。

冯玉祥在这次革命转变中，基本上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妥协性的特点。五原誓师前后，当其受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压迫时，西北工农群众革命处于开端尚未与其利益发生冲突之际，他积极拥护和参加革命，主张唤起农工，但从1927年5月起，其军事实力大增，西北群众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到有威胁其阶级企图和利益时，就日趋右倾。在他看来，“唤起农工”只是要农工起来，交捐完粮服役，支持他的军队打仗。现在农民居然掌握政权，惩处土豪劣绅，要求土地革命，这就冲破他所能接受的范围。他认为工农运动的发展妨碍了税收和军队给养的征发，会成为他军事集团继续发展的障碍。因此，他对工农运动和共产党的态度产生了逆转的变化：他规定对陕西的共产党报纸进行严格检查；规定对有“越轨”行动的农民实行惩治，直至枪决；将西安一家工厂罢工的领导人进行逮捕。正如毛泽东所说：“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sup>⑥</sup>

冯玉祥家境贫寒，从小当兵行武，使他形成两种矛盾的思想，即救国救民思想和浓厚的封建军阀思想。由于这种矛盾思想的严重影响和制约，导致他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前后判若两人的矛盾行动。他的救国救民思想，使其具有跟随时代潮流，倾向或参加革命的主动性；他的“军事第一”，以考虑军队的进退成败为重要法码的军阀思想，导致其在军队处于压迫困境而革命形势蓬勃高涨时，就被迫倒向革命，使其革命带有被动性和阵发性的弱点。不可否认，冯玉祥五原誓师时就怀有重振国民军、增强自己军事实力而响应北伐的因素。国民革命中，他根深蒂固的军阀思想并未得到改造。那么，当革命形势低落时，这种军阀思想势必作祟，在反动势力的威胁利诱下，促使他倒向反革命阵营，以苟图其军队的生存和发展。会师中原战役后，冯玉祥军队虽有很大扩充，但粮饷缺乏，全军暴露于奉鲁军阀面前。他担心奉鲁军阀利用宁汉对立的形势卷土重来，而他的部队首当其冲孤立无援会再度失败。加之此时蒋介石愿对他的困难竭诚相助，答应自7月份起按月接济军饷250万。于是，他为缓和其军事、经济上压力，当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境况下，采取了撮合宁汉、共同北伐的方针。

诚然，冯玉祥的这次革命转变是有限度的，以至在大革命末期政治态度右转，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但他作为与同时代的北洋军阀相比，只有他没有投靠过帝国主义，只有他真正和共产党建立过合作关系，高举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旗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我们更要看到，他毕竟长期生活在军阀制度的军队中，经历了含辛茹苦的奋斗，才得以从一名晚清士兵上升到统兵几万以至数十万的军阀将领，因此他不愿意轻易冒险，其前进的步伐就显得沉重而艰难，甚至徘徊和倒退，他政治思想的认识也不可能一次就实行根本的转变，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于他的。总之，他在这次革命转变中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经历，对以后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爱国为民、不断前进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是毫无疑义的。

注释：

- ①② 1982年9月11日9月15日《人民日报》。
- ③④⑩⑫⑭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11、27、381、421、481页。
- ⑤ 《冯玉祥先生大事年志》，第2页。
- ⑥⑪⑬⑮⑯⑰ 《冯玉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6、22、18—21、20、22、44—45页。
- ⑱⑲ 《冯玉祥日记》卷6第73—74页、卷7第60页。
- ⑳ 《恽代英文集》下集，第966页。
- ㉑⑳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78、111、34页。
- ㉒ 独秀：《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载《向导》周报(汇刊)第3卷第146期，第1347页。
- ㉓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48页。
- ㉔ 《1926年7月23日张树声致张作霖电》，见奉天省公署(镇威上将军公署)档案，第1545号，辽宁省档案馆藏。
- ㉕ 陈森甫：《西北军建军史》，第93页。
- ㉖⑳ 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第58、53页。
- ㉗ 转引自：《国民军甲子革命纪实》，第32页。
- ㉘ 简又文：《冯玉祥传》，第225页。
- ㉙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2册，第72页。
- ㉚ 《1926年4月10日国民政府致冯玉祥信》，见《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中的影印件。
- ㉛ 《中共北方区对于三特别区(即内蒙)及西北军中工作的意见》，《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
- ㉜⑳⑳ 《冯玉祥回国后之国民军》，《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 ㉞ 参见[苏]维·马·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第8—10页。
- ㉟ 《冯玉祥大帅关于中国局势的谈话》，载《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辑，第212—213页。
- ㊱ 《1926年6月17日冯玉祥给蒋介石、谭延闿的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㊲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就职通电》，见奉天省公署(镇威上将军公署)档案，第55号，辽宁省档案馆藏。
- ㊳ 转引自：《国民军革命史初稿》下册，第442页。
- ㊴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第228页。
- ㊵ 《冯玉祥给仲甫同志的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
- ㊶ [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54页。
- ㊷ 《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第4编，第6—7页。
- ㊸ 周恩来：《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载1941年11月14日《新华日报》。
- ㊹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 ㊺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602—603页。